

January 2026



遭受攻击的社群： 美国的保护需求

Contact

Roz Lee
U.S. Head of Mission
rlee@nonviolentpeaceforce.org

Megan Rodgers
U.S. Policy & Advocacy Manager
mrodgers@nonviolentpeaceforce.org



I. 介绍

美国各个社区正受到对公共空间的极端限制、针对公共安全的军事化手段、日益严重的基于身份的暴力、政治领袖的强烈种族主义言论以及前所未有的拘留人数。与此同时，州和联邦用于暴力预防项目、公共卫生和社会服务的资金遭到削减，限制了社区保障自身安全的可用资源。

本简报旨在说明针对平民的主要威胁会对特定群体造成的影响，并探讨在美国如何通过社区层面的努力保证安全，预防暴力。本简报并非要全面分析美国平民遭遇的所有形式的暴力，而是特别关注针对平民的、有目的性的、系统性的暴力。

II. 研究方法

本项评估由非暴力和平力量（NP）于2025年9月完成，收集了九位在美国各地从事社区安全、暴力预防以及司法和问责工作的专家访谈。访谈和分析由案头研究组成，包括美国政府官方数据、学术研究以及政策机构和民间社会团体的报告。这份简报也源自非暴力和平力量自2020年以来在美国各地支持社区安全和打破暴力循环的经验。



III. 日益萎缩的保护环境：对公共空间的攻击

公共空间，即公民社会和公民个人可以组织起来，分享信息，参与对话和表达异议从而为影响生活的政治决策做出贡献的环境，在美国过去的十年间持续地受到威胁。自2025年1月，限制措施更是迅速升级。这些限制体现于当地、州和联邦政府的武力措施（即“国家暴力”），并且往往是出于政治目的（即“政治暴力”），包括攻击非营利组织与平民抗议者。对此，许多国际监督组织警告称这是公民自由的衰落和民主的倒退。

美国政府严重依赖暴力来限制公共空间和压制异议。国家暴力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历史上的暴力行径为当今许多社群遭遇的暴力奠定了基础。国家暴力有多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对社群造成伤害。

美国警方的日益军事化加剧了国家认可的暴力，警方实施的暴力行为和杀害持续上升。警察暴力广泛发生。在2024年，至少有1260人死于警察之手，超越了过去十年中的任何一年。这种暴力也带有歧视性，黑人在美国被警察杀害的可能性是白人的2.8倍。

美国未经授权且非法在洛杉矶、华盛顿特区、孟菲斯、波特兰和芝加哥部署国民警卫队，证明了军事化进一步加深了歧视行为，引发了对威权主义的更广泛担忧。国民警卫队或其他军事力量的未来部署带来的威胁持续引发恐惧，也说明了自2025年1月本届政府上任后，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和漠视民主实践的模式仍在持续。

政治性暴力事件的比例不断增加也导致了公共空间的萎缩和民主的倒退。自2016年以来，美国的政治暴力增长明显，当前达到了5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一趋势中穿插了多起令人震惊的袭击事件，例如，2025年6月，两名明尼苏达州议员及其伴侣被枪击，2024年7月，彼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被暗杀未遂，保罗·佩洛西遭遇的暴力袭击，以及2025年9月，政治活动家查理·柯克被谋杀。这些针对知名政治人物的大规模袭击事件背后，隐藏了一个不断升级的趋势——针对地方公职人员、联邦法官和国会议员的威胁和骚扰。

美国政治暴力的威胁经常涉及到枪支使用。这反映出，与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相比，美国平民的枪支拥有率极高，并且，在新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期间和之后，首次购枪数量出现了激增，同时人们对政治暴力的接受度不断提高。易于获得枪支使得政治暴力和基于身份的暴力更加致命。

集会自由和抗议权正在遭受攻击。自2017年以来，45个州和联邦政府提出了355多项抗议法案，其中55项已获得通过（主要在南部和中西部地区）。联合国指出，其中一些法律违反了国际法和美国宪法。

这种镇压反对意见的行为具有歧视性，明确划分了谁可以抗议，而谁不可以。参与了支持巴勒斯坦抗议活动的国际学生被有针对性地、系统地取消了签证，部署在洛杉矶的国民警卫队镇压针对移民突袭的大规模和平抗议活动。与此同时，1500多名因参与2021年1月6日进攻美国国会而被起诉的人获得了全面赦免。拒绝给予某些群体权利、正义和保护，同时却主动捍卫和保护其他群体，表明当前国家暴力具有针对性。

公民社会组织，特别是那些对保护政治权利、法治和代议制民主至关重要的组织遭到针对性打击，进一步限制了公共空间。自特朗普政府第二个任期开始，一种明显的模式已经显现：取消联邦资金、攻击可信度、威胁不结盟非营利组织的免税地位。愈发严重的言论限制也长期针对记者与媒体，批评性媒体受到法律诉讼的威胁，公共广播协会（PBS）和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等主要公共媒体机构的资金受到限制。这些行动的目标是限制异议，质疑反对者的可信度，并消除弱势群体获得支持的途径。

IV. 面临风险的社区

在一个公共空间不断萎缩，威权主义抬头，警察部队军事化的社会中，人人皆不安全。然而，许多群体由于他们所代表的身份面临着更大的风险。

在美国，基于身份的暴力十分普遍。暴力政治言论和取消对目标群体的保护使得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更加肆无忌惮。根据联邦调查局（FBI）的数据，2024年，美国共报告了11 679起仇恨犯罪案件。这一数字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最高是2023年的12 498起。由于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存在重大缺口、不一致和漏报情况，实际的事件数量可能要多得多。

与国家暴力同步，有时甚至得到国家暴力的默许支持，宣扬仇恨和暴力的团体越来越受欢迎。南方贫困法律中心（The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发布的仇恨地图（Hate Map）显示，美国各地共有1371个具有仇恨和反政府意识形态的团体。以下部分概述（并非详尽）了美国境内面临更高程度有针对性暴力的威胁、因此需要重点支持和保护策略的群体。

关于交叉性的说明：

每人都拥有多种相互关联的身份，这些身份影响着他们遭遇暴力的风险。具有多种暴力攻击目标身份的人，由于多种歧视的叠加和累积效应（克伦肖称之为交叉性），会面临更高的风险。例如，在美国，黑人变性女性面临着极其严重的暴力，占美国被谋杀的变性女性的78%，这种现象与种族主义和恐变性仇恨的叠加有关。与之相似地，由于酷儿身份与移民身份的重叠，性少数群体（LGBTQ+）移民有更高的风险遭受有针对性的暴力。来自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BIPOC）社区的性少数移民面临的暴力风险甚至要更大。美国境内的社会经济水平和地理位置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个人和社区成为暴力袭击目标的概率。在制定保护计划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复合性的风险因素，以便为目标个人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1. 移民社区

在国家许可的针对移民社区的持续袭击中，国家暴力和基于身份的暴力密切相关。自2025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活动显著增加，每天有近1500人被驱逐出境，达到了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驱逐出境通常是将移民遣返至他们起初为了在美国寻求安全而逃离的暴力和危险环境，或是送回有侵犯人权恶劣行径记录的第三国拘留中心，明显违反了“不驱回”的国际原则。

对移民群体的歧视源于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政客们散布有害的错误观念并夸大其词，将经济困境、文化变迁和暴力事件归咎于移民。近期，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从法律上许可了移民执法中一贯的歧视，允许移民官员按照种族作出决定。打击合法移民途径，以及为让无正式文件的移民在美国无法居留而构筑的恐吓策略，反映出了阻止移民进入美国的一种蓄意行为。这种恐吓策略在南部边境地区被粗暴地实施，导致了大量的移民死亡。

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突击检查不仅越来越频繁，暴力事件也越来越多。戴着面罩、身穿全套战术装备的移民官员在突袭行动中经常使用催泪瓦斯、闪光弹和其他暴力武器。这种行动曾多次导致联邦移民官员的目标人员死亡和/或受伤。2025年9月12日，在芝加哥的一次交通拘留中，西尔维里奥·维勒加斯·冈萨雷斯被一名 ICE 官员枪杀。2025年10月21日，卡利托斯·里卡多·帕里亚斯和一位美国副法警在一次 ICE 拘留行动中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2025年12月31日，在洛杉矶新年庆祝活动中，基思·波特（小）被一名下班的 ICE 人员杀害。2026年1月7日，蕾妮·古德在明尼阿波利斯监视 ICE 活动时，被其工作人员杀害。2026年1月8日，在波特兰一次针对性的交通拘留中，约勒尼斯·贝扎贝斯·赞布拉诺·孔特雷拉斯和路易斯·大卫·尼科·蒙卡达被一名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人员（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gent）枪杀。这些例子并不少见，并且还可能增加，考虑到联邦政府大幅拨款给移民执法，用以加快 ICE 官员的招募和培训，这很可能导致更多的不正当拘留，大幅使用武力和其他滥用行为。

地方警察局与 ICE 的合作增加，进一步疏远了移民社区，限制了他们在遭受侵害时能够采取的应对方式。这种合作关系会损害公众信任，连警方自身也担忧这样做会导致公共安全恶化。故意制造恐惧的环境也会对移民和移民社区的健康和福祉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带来的连锁反应会波及当地经济和当地的支柱企业。

被 ICE 扣押的移民很可能在拘留中心遭遇暴力，并被忽视。许多人被强迫失踪，他们的家人追踪他们的下落所能依据的资料很少，甚至没有。数百名被拘留者已被转移或从数据库中删除得痕迹全无。羁押期间遭受虐待的后果可能是致命的。2025财政年，至少有23名移民在 ICE 监禁期间死亡，死亡人数达到了至少二十年来的峰值。恶劣的条件、医疗护理被拒以及长等待时间加剧了拘留者的绝望情绪，他们更可能试图自杀或死于疾病和伤残，因此，被拘留者的死亡率可能会继续上升。

2. 性少数群体社区

性少数群体，特别是变性者，成了本届政府的打击目标和替罪羊，而政治性打击正在煽动其他人的暴力袭击。根据地方司法管辖区提交给联邦调查局的数据，2024年，基于受害者性取向的袭击占有仇恨犯罪的17.2%，基于性别认同的袭击占4%。2024年5月1日至2025年5月1日期间，同性恋者反诋毁联盟（GLAAD）追踪到了932针对性少数群体的事件，遍布美国4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相当于每天发生2.5起事件。针对性少数群体的立法攻击目的是限制其权利、权限和可见性，影响相当严重。截至2025年，已有超过600项反性少数群体法案被提出。大多数法案侧重于限制变性者的权利。

变性者长期被推到美国社会的边缘，基本人权被剥夺，并成为暴力行为的目标。在政治说辞和去人性化言论的煽动下，针对变性者的袭击数量正在急剧上升。2025年同性恋者反诋毁联盟的警报报告（2024-2025）指出，在所有反性少数群体事件中，有52%专门针对变性者和性别非常规者（932起事件中有485起），

相比2023-24年报告期间增加了14%。与此同时，变性者的权利也遭受了打击，仅2024一年就提出了600多项反对变性者的州和联邦法案，创下了新纪录。

自2025年1月以来，公职人员的抹黑和仇恨言论进一步加剧了对变性者的打击，而一系列意图将变性者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的行政命令则进一步将打击变成了制度。立法和行政打击包括剥夺医疗保健权益、禁止服兵役、禁止参加体育赛事、取消性别确认身份证明以及从历史记录中抹去变性者。这些管制使变性者处于危险，将他们排斥与隔离在公共生活之外，限制了医疗保健服务，也约束了行动自由。

“针对变性者群体的打击不仅增加了他们遭受暴力的风险，也增加了所有不符合传统性别二元论的人的风险，”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高级政策委员会成员阿利·克里斯蒂安表示。这些政策无疑会让变性者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但营造出的一种怀疑和恐惧的氛围，使每个人都感到不安全。

3. 种族和族裔社群

在“文化战争”、白人至上主义运动复兴以及反移民言论的煽动下，针对少数族裔与种族的暴力事件正在美国卷土重来。在2024年向联邦调查局报告的仇恨犯罪事件中，民族、种族或血统是最主要动机（53.2%），独立监测机构则反映高度有针对性的暴力，其对象是黑人、原住民、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AAPI）、拉丁裔和阿拉伯裔群体（相较其他群体而言）。

在美国历史上，黑人一直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暴力袭击的目标。由于警察普遍不受惩罚，政治领导人鼓吹种族主义，针对性的歧视更有了动力。黑人群体是警察暴力的首要对象，也最有可能成为其他平民实施基于身份暴力的目标。警察与黑人的日常交流，例如交通拘留，呈现格外暴力，而警察却不太可能因此受到追究。

原住民社区同样有长期遭到暴力和压迫的历史。在失踪或被谋杀的人中，原住民妇女的比例远超其他人口群体。而与美国普通民众相比，整个原住民群体面临着更高的暴力风险。政府网站将与此类暴力事件有关的重要报告删除，这表明政府无意问责，并有意模糊数据。

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持续遭受有针对性袭击，而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此类袭击事件急剧增加。虽然2021年后，针对亚裔群体的仇恨犯罪报告数量有所下降，但针对亚裔的仇恨程度仍然很高。停止亚裔仇恨（Stop AAPI Hate）组织的调查指出，超过一半（53%）的亚裔成年人表示在2024年经历过仇恨行为。自2024年11月以来，反移民言论和政策也导致了对亚裔的仇恨情绪大幅上升，这显示针对亚裔群体的攻击仍在持续。

反拉丁裔和反阿拉伯裔的暴力行为与反移民和反穆斯林情绪密切相关，在本报告的其他部分有所讨论。但是，这些情绪与种族偏见和白人至上主义有着明显的联系。

我们之中有一些长者经历过民权运动时期，他们看到了2025年与1964年的相似之处”

——布里亚·尼尔森，种族正义与公平研究员，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

4. 宗教少数群体

针对宗教少数群体的袭击事件激增，其原因是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与巴以战争相关的反犹太和仇视伊斯兰教的攻击。基督教民族主义在美国长期为主导，许多人认为美国有上帝赋予的使命，要保护和兴旺白人基督教新教徒。近年来，虽然美国各地对基督教身份的认同有所下降，但它仍然主导着政治讨论，在“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运动的支持下，成了近期“文化战争”的辩护理由。

数十年来，保守派领导人一直在基督教的神学框架中构建他们对美国的愿景，64%的白人福音派基督徒信奉或支持基督教民族主义，而大多数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信奉或支持者同意，他们“更希望美国成为一个主要由信奉基督教的人组成的国家”。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拥护者支持政治暴力的可能性是其反对者的近七倍，并且在意见不统一时表现出更强的诉诸暴力倾向。即使在那些可能不完全认同基督教民族主义目标的人当中，有相当多的人支持基督教思想持续影响政策制定，44%的美国人同意“政府不应该宣称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应该提倡基督教的价值观。”对基督教传统的压倒性支持将信仰其他教义的人推向边缘，也让他们因自己的宗教信仰而面临着更大的暴力风险。

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恐怖袭击，随后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以来，针对犹太人、穆斯林和阿拉伯社群的仇恨行为显著增加。这些行为导致了人员死亡、伤害、宗教场所损毁以及个人财产损失。美国对犹太群体的仇恨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而将以色列政府的行为与犹太群体混为一谈则加剧了这种趋势。美国针对穆斯林群体的仇恨也在增加。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 (CAIR) 2024年在全美各地一共收到了8 658起关于反穆斯林事件的投诉，是该组织历史上收到投诉数量的最高值。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本身也因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杰森·史密斯试图取消其非营利组织地位而受到打击，这一打击直接彰显了消除对美国用行动支持以色列的异议与批评的企图。现任政府对反犹太主义的定义过于宽泛，以限制对以色列国家的任何批判，进一步巩固了将犹太人与以色列政府等同、将亲巴勒斯坦运动与哈马斯等同的思维，严重阻碍了反对加沙种族灭绝的倡议。

第三个持续遭受暴力侵害的宗教少数群体是锡克教徒，2024年的联邦调查局报告称，针对锡克教社区的袭击事件达到了153起。锡克教社区不仅受到其他社区成员的攻击，而且还成为全球跨国镇压计划的一部分。

5. 无家可归者

无家可归者遭受暴力的可能性明显高于普通人群。据估计，约有14%至21%的无家可归者曾遭受暴力行为，而普通人群的这一比例约为2%。对无家可归者的安全漠不关心，直接呼吁对他们施暴的现象十分普遍，如福克斯新闻评论员布莱恩·基尔米德就曾发表轻率的言论，呼吁对街头流浪者采取注射死刑。这种言论与危险的行政命令不谋而合：这些行政命令要求将无家可归者驱逐出公共区域、扩大非自愿民事收容的范围、终止有成效的“住房优先”计划以及一些其他行动。这种将无家可归者非人化的做法将他们看作无足轻重，助长了有针对性的暴力行为。自1999年以来，至少有 588起杀戮事件和近2000起暴力袭击事件似乎都起源于受害者无家可归的状况。

Protecting
Ourselves & Our
Communities
SAFETY DEMONSTRATION

Nonviolent Peaceforce



6. 女性、女性气质者以及寻求生殖保健的人群

对生殖保健的限制以及对寻求生殖保健人群的攻击，让女性、酷儿群体和医疗保健提供者遭受更高的暴力风险。自从2022年秋季多布斯案判决推翻了罗诉韦德案先前提出的堕胎保护以来，针对堕胎服务提供者、医疗中心和接受堕胎服务者的暴力事件持续增加。

这种暴力也指向抗议或参与其他旨在保护堕胎权利行动的人群。这些行动有更高的风险遭遇反示威者的升级冲突，包括有针对性的威胁和暴力袭击。这种风险促使像妇女游行（Women's march）这样的维权组织在决定何时何地举办活动时认真考虑自身安全问题，因为美国各地的风险评估各不相同。“除了区域因素之外，甚至还要考虑城乡因素。在小城镇和社区举行活动会面临更高的威胁”，妇女游行组织理事塔米卡·米德尔顿表示。

米德尔顿还指出，生殖正义领域的暴力事件日益增多。“我们意识到，不仅是大选后，而是竞选期间，威胁的发生频率和明目张胆程度就比从前要严重。”网络上的暴力和厌女言论变多，“人们觉得自己更有正当理由、更加无所顾忌地表达暴力威胁”。这种言论体现在法律不仅禁止堕胎，还将其定为犯罪，并强化惩罚措施使暴力延续。在南卡罗来纳州，人们曾多次尝试将堕胎定为重罪，处以与杀人相同的刑罚；在德克萨斯州，立法机构打开了民事起诉寻求或协助堕胎的人的大门，包括起诉州外的当事人。

应对美国日益严重的暴力问题

1. 非武装应对

面对威胁、暴力和排斥，各个社群团结一致，共同应对他们遭遇的挑战，保护彼此的安全。由于国家行为体造成或是暗中支持许多威胁，因此要捍卫公共空间、保护目标群体以及中止暴力和军事化的循环升级，非暴力形式社区主导的安全倡议至关重要。不幸的是，联邦政府削减资金大幅削减了许多正式的安全倡议，使得安全干预优先于社区主导的干预之上。

为了应对这一需求，互助网络正在扩大支持的范围，将安全工作纳入其中；移民权利组织创建了匿名且易于使用的报告系统，以便向社区网络通报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活动；旨在培训与支持社区安全倡议的组织也目睹了对专业知识日益增长的需求。诸如美利坚共同立场（Common Ground USA）的和平建设组织者尝试团结起美国人民，促进跨越差异的合作、联系和信任。其他组织，例如治愈暴力（Cure Violence），致力于和可信赖的通讯人及当地行动者合作，以阻止社区内的暴力，改变社会常态。为了应对关闭公共空间和政治暴力加剧的担忧，元和平队伍（Meta Peace Team）与其他团体正在培训、组织和动员社区成员，在抗议和选举等高度紧张的时刻如何缓和冲突。弥合分歧倡议（BDI）一直支持这些应对日益增长的政治暴力的非暴力措施，通过开展行动导向的研究、召集跨部门合作伙伴以及将证据转化为实用工具——特别是其社区安全和缓和局势指南，这是一个交互式的、按州划分的地图，将社区与可用的安全和缓和局势培训联系起来。

多位受访者指出，要加强数字安全和媒体素养培训，以及安全规划和非暴力干预策略。像1800万崛起和灯塔这样的组织正在通过为平民提供数字安全工具和利用新技术在危机时期为平民提供重要的安全信息来满足这一需求。

这项风险分析是了解正在威胁并破坏美国社区安全的已存在和新兴挑战的一个关键步骤。它还阐述了非暴力和平力量如何在美国实施非暴力保护，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 为在公民空间和公共场所面临高度担忧、恐吓和风险的社区**提供直接的保护和护送**。在对特定情境的风险分析指导下，非暴力和平力量优先现身在受威胁和有针对性的恐吓最为严重的个人和社区。保护性出现和护送的重点在于阻止骚扰和形势升级等直接的威胁，同时确保人们能够安全地参与社区活动。
2. **加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社区主导的安全和非暴力干预**。各个社区面临着日益增长的风险，以及在非暴力保护的措施与资源方面存在着准备程度、获取方式和实施能力的差距。有效的安全干预措施会考虑所有背景因素并提供满足社区和个人特定需求的支持。非暴力和平力量通过非暴力社区主导方式，增强青年领袖、基层组织者、志愿者和宗教领袖的能力，从而对风险实施预判、预防与响应。这些方式包括组建社区安全团队，将保护措施从短期存在转变为可持续的社区主导的安全模式。
3. **深化伙伴关系和网络，加强非暴力保护协调**。伴随风险的出现，社区安全团体之间的密切协调日益重要。非暴力和平力量关注协作和信息共享，与社区组织合作制定安全规程，加强预警系统，提升准备状态。这样确保了高效、及时的响应，同时强化了社区安全网络之间的协调、数据共享与学习。